

东北师范大学函授讲义

中國文学

(魏晉南北朝部分)

逯欽立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

1958. 5. 出版

魏晉南北朝文学

目 录

結 論	1—10
第一章 建安时代的作者曹植	10—24
一、蔡 琰	11
二、曹 操	13
三、建安七子与繁欽	18
四、曹 植	21
第二章 嵇康与应璩、阮籍	25—34
一、所謂正始时代	25
二、嵇 康	30
第三章 兩晉作者与左思	35—39
第四章 陶 淵 明	39—55
第五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56—79
一、南朝的乐府民歌	56
1. 南朝乐府民歌的种类、来源及其特征	56
2. 南朝反映劳动生活的乐府民歌	59
3. 南朝反映社会风习和爱情生活的乐府民歌	61
二、北朝的乐府民歌	65
1. 北朝乐府民歌的眞象	65
2. 北朝的英雄詩与牧歌	66
3. 木 蘭 辞	70
三、有关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其他重要問題	76
第六章 南北朝的作家作品	79—102
一、南朝的作家作品	80
1. 謝 灵 运	80

2. 鮑照	83
3. 謝朓	92
二、北朝的作家作品	94
1. 酈道元與水經注	95
2. 楊街之與洛陽伽藍記	98
3. 庾信的寫作	99
三、南北朝某些作家作品的歷史意義	101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的小說故事	102—109
一、志怪故事、這一類故事搜神記的韓凭夫妻和 干將莫邪可成為代表	103
二、搜神記還有紫玉和童女斬蛇的故事	107
三、歷史故事	108
四、志怪、逸事對後代的影響	109
結語	109—111

魏晉南北朝文學

(公元196—589)

緒 論

从后汉献帝刘协建安元年(196)到陈后主陈叔宝禪明三年(589)，这將近四百年的期間，即由二世紀到六世紀的期間，是我国封建社会次于中世紀的阶段。

暴发在中平元年(公元184)的黃巾大起义，动摇了后汉帝国的封建統治。但由于农民領袖早死，地主武裝力量相对强大，黃巾軍遂未能直接推翻这个腐敗王朝。黃巾軍起义失败后，东汉的表面統一局面为軍閥混战的火焰所燒毀。

軍閥的混战使全国尤其兩京附近陷入凋敝不堪的景象。李愷郭汜等攻伐屠杀之下，“关中无复行人”。西京一帶，“白骨盈积，殘骸余肉，臭穢道路”。刘协回到洛阳，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輸不至。”官吏四出采积有的餓死在廬巷。河北淮南一帶，袁紹袁术等只能靠棧聚羸蒲当軍粮，以此占据一方。某些軍閥并且勾引来周边的羌胡軍隊参与了他們的暴乱。他們大量地屠杀人民，“杀民社下，載妇女財物”，所到之处，“鷄犬亦尽，廬邑无复行人”。至使“万姓流散，死亡殆尽”。被羌虜去的女作者蔡琰，曾以她的悲憤詩描写了羌胡蹂躪中原的慘狀及其个人的悲慘遭遇。

这期間全国十二州人口减少到七八百万的数目，赶不上汉时的一个大郡。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就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所謂建安时代。这时候新起北方的曹操，把一些飽經战乱的文士招集在鄴城，維護和粉飾其新的封建統治。盛行在民間的五言乐府詩，使建安时代作者們有了新的写作道路⁽¹⁾。曹操这时所写的詩歌，如薤露、蒿里行及却东西門行等篇，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东汉統治者的腐朽統治与軍閥混战所造成的災难。而如建安七子等文士，他們感叹汉朝的傾复，

社会的凋丧，人民的流离失所；以及自身的不幸遭遇，心情是沉重的激昂的。当他把这些生活内容写在五言诗中，便构成所谓“慷慨多气”的时代风格，即所谓建安风骨。

由于财富与生产遭到破败，稀少人口多数沦为各地主集团的部曲佃客和僮奴，建封经济向着更为落后的自然经济倒退。由于地主阶级坚固的割据观念的存在，所以军阀地主的二三十年混战导致了三分鼎立之局。也是因为如此，魏朝的创始者曹操，用严酷的刑名法术替代破产的“今文”儒家信条。力图加增中央集权统治和个人权势，打击危害统一的世族豪门。企图树立起坚固的法制政治。曹操以权谋驾驭僚属，并设置“校事”利用“质任”对部曲进行监视。曹操的严峻的法制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两个有名的令文（整齐风俗令、求贤令）。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曹丕篡汉以后，曾针对后汉选举制加以更改，设立了九品中正制⁽²⁾。而伴随着法制思想与九品制度所兴起的老庄玄学在正始时代又成为他们统治人民调整统治者内部冲突的理论根据⁽³⁾。中正制与玄谈相结合品题人物是一个焦点。这种品题客观上成为大地主阶级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和文化垄断的工具。九品制设立，在朝门阔地主分别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这种的选举制度，只能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状态。他们大倡玄学，崇尚自然无为。实际上，他们是以自然无为来巩固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既得的特权，让被压迫者不要有作为、不要反对他们。同时，自然无为也正好为他们的无能，他们的寄生生活作辩解，为他们的放荡无耻行为来遮羞。而且自然无为的论调，必然把劳瘁庶职的寒门小吏划出去予以贬低，以显示他们的尊显；必然会麻痹被压迫者，使他们迷信“无为”，从而降低了斗争意志。显然，玄学与九品制一样，是没落的门阔地主维持其封建统治和政治特权的一种文化工具，它是当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有人以为玄学是魏晋人的“人性的觉醒”云云，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

清谈玄学骨子里含有浓厚的政治目的。擅长玄谈才能成为名士，从而以上品人物获得高级官僚。因此，为了高官就要竞争上品，为了成为名士就要讲求玄学。玄学上的竞赛就是名利上的斗争。为社会景

仰的名士与操持政权的实力派曾在一定年內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如何晏、夏侯玄及嵇康等都是当时被杀害的名士。所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存者”。詩人嵇康与阮籍，都是崇尚自然无为的玄学的。但是，他們并非与統治者一样把玄学的談論作为維持封建特权攫取功名富貴的敲門磚，而是以自然无为作为生活實踐的根据。从而隱身埋名逃避現實，企图保全他們的生命。而且与門閥貴族的以談玄求名竟夺权势正相反，嵇康阮籍曾分別地以他們的作品，主張“絕圣棄智”（如秋胡行）及“背棄夸与名”（如詠怀），拒絕与統治階級同流合污、否定封建社会的統治制度（如嵇康的答难養生論及阮籍的大人先生論）。道教玄理本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至此都一定程度的具有反封建性質。当然，由于兩個人具有不同的品質性格，他們的遭遇与結局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說阮籍为了生命曾屈服于司馬氏的統治，而嵇康則在与統治者上付出他的生命，表現了他的堅貞不渝的斗争精神。

在玄学品題昌盛时代氛围中，曾产生有关的專書，如鍾会有四本論，刘劭有人物志，何晏有道德二篇，王弼向秀有老庄注釋等。而在曹家与司馬家的政权爭夺中，忠于皇室的应璩，曾以他的“百一詩”写出他的忧国諷世的激情。

統一三国的西晉王朝，其統一的时间仅仅十年。西晉命运这样短促不是偶然的。司馬炎平吳以后，頒布了以九品制为标准的占田廬客制度⁽⁴⁾。这种制度可能是为了巩固封建統治对門閥大族的特权做出某种限制，实际上也是对門閥大族已經取得的政治經濟特权进一步确定下来。許多門閥地主所兼并的土地更广，所控制的佃客更多。当时的門閥官僚如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蒼头八百余人”，“后房百数”，田宅与此相称。如驢宗占田二百頃，王戎“广收八方園田，水碓局遍天下”。門閥官僚集中了土地和財官，他們奢侈荒淫达于极点。晉書，世說新語对何曾、王愷、石崇等的生活記錄，表現了当时剝削階級腐敗墮落蛮橫无耻的生活丑象。驕奢淫逸医治不了他們的精神空虚。因此，他們要鳩集一些文人学士曲宴高会并写作了一些用事用典的“雅詩”濫品，而石崇的金谷集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們貪圖灵魂的陶

醉，悲叹生死的无常，于是以游神詩挽歌詩乃至于下神歌詞以弥补其物質生活所不能滿足的貪欲。

門閥官僚是寄生者是无能的庸才，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壟斷了九品制的选举权。所謂清流風流的上品永远是由他們包办。除了驕奢淫逸生活以外，他們把过去各种名士行为都包下来，用以点綴出其名士派头。例如王衍、王澄兄弟，他們一面是浮華的清談者⁽⁵⁾，一面是虛无的放达派⁽⁶⁾，既是要模仿何晏，又是效颦阮籍。他們一身面二任之，成为双料的名士。煽起了門閥官僚临死时才痛为后悔的“浮虛”惡風。这种惡風曾使他們更加腐敗与墮落。他們用高談玄理麻醉自己也在麻醉其他的名士文人。但是他們却自認是名士風流。他們是“散髮裸身，对弄婢妾”；有的故意“濯脚于稠众，浚便于人前”。表示他們的任达放蕩。无能的士胄高踞官位，伤風敗俗。有能力有作为的寒士寒族几乎丧失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样就引起寒士寒族的不滿不平，形成頗为劇烈的社会矛盾。高平文士王彥伯，因为“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浮沉”，就被当时的豪門所压制，在政治上失掉应有地位，他激憤之余，曾用“杂文”的体裁写了一篇“釋時論”。这篇文章通过人物問答的艺术傳統方式，表現了元康时代在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爵命不出朝廷的門閥統治下，那种道义扫地是非混淆的黑暗景象⁽⁷⁾。魯褒的錢神論，蔡洪的孤憤論，同样是当时寒士的呼声。詠史詩的作者左思也正是因为深刻地反映了这样的现实面代表了当时的文学創作的进步傾向。

代表門閥地主利益的西晉封建統治，使社会矛盾趋于复杂化与尖銳化。統治者的揮霍豪華是来自对人民的剝削与掠奪。这加深了剝削者与被剝削者的矛盾，統治者的壟斷政權迫使失意的寒士离开中央而分布于各王国，这形成了統治者内部的矛盾。晉初諸王割据形势又最容易导致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在上述的复杂而尖銳的矛盾中，八王之乱終于爆发，引起了西晉的衰亡与異族的侵凌。以祖逖为首抗战力量曾活跃于中原一帶。刘琨等的詩歌写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現的。刘琨的詩篇表現了时代的乱离与志士的复国心情。

东晉偏安以后，門閥地主大量占領土地与山川。王导在鍾山有田

八十餘頃。王羲之在山陰有蘭亭別墅，在那里“大營田塾”，亲身“行田視地利”。謝安在會稽有田產數十處，湖泊四個。謝玄有始寧別墅；那里有山有水有田產，謝混有田業十餘處，“園田十餘處所”。刁逵有田萬頃，奴婢千人。門閥地主經營山居別墅，是他們的立業和政治上的退身地。他們一方面用來剝削“佃客”“門生”獲得物質享受，一方面也用來追求精神逸樂或游宴場所。人們知道，當東晉統治者內部衝突加劇時，王羲之曾退居山陰，他和賓友子弟等繼承石崇金谷集遺風賦詩飲酒于蘭亭。他們的詩篇為後來的山水詩開辟道路。等到劉宋的新貴門閥對門閥世族實行分化與鎮壓的時候，謝靈運也曾回到始寧別墅繼續寫他的名重一時的山水詩。

東晉政權為門閥世族所操縱。連中小地主也很難得到仕宦。不能參與政治的寒門庶士如劉麟之、戴安道、劉遺民等，他們都通過隱士生活實現其自然無為的生活理想。他們是繼承了玄學思想，但已經不是以國中玄理當作干祿的工具。而鮑敬言的無君論，則根據道家理論對封建制度與封建君主作進一步的抨擊，徹底戳穿封建統治剝削的不合理⁽⁸⁾。道家自然觀點的進步面更為擴大。東晉末年，社會危機更嚴重，階級矛盾更尖銳。一方面，統治階級火并頻繁，篡奪之事已經到來，另一方面，“權門兼并，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中曾發生了以孫恩為首的農民暴動，也出現了躬耕自資幻想唐虞時代的田園詩人陶淵明。

包括宋齊梁陳的所謂南朝。它保留了東晉所不能解決的社會矛盾。但因為四個朝代的創建者都是寒素出身的軍人，所以南朝各具有與晉不同的特點。南朝統治者為了加強其中央集權，他們在具体統治措施上，一方面對門閥士族採取打擊與利用的策略，消滅東晉以來“政出多門”的現象，一方面分封宗室子弟企圖鞏固皇室的封建統治。門閥士族經過頻繁的政爭與改朝換代，本來是日趨沒落的。在這種情況下逐漸由政治上的支配者變為政治上的幫閑：不是成為皇朝供奉，便是淪為王國侍從。宋文帝劉義隆對於謝靈運“唯以文義處之”，不使他接觸朝政。武帝蕭賾重用寒人，說：“人生何必計門戶”。說明了各王朝新的情勢。至于王國，如劉義慶、蕭子良蕭統等也都在不

同程度的“招架文学之士”，从事大规模的编纂与创作。这样一来，南朝的文学侍从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出现了署名刘义庆的世說新語，出现了永明体詩与四声論，出现了如昭明文选这样的选集，以及許多批評文章乃至文心雕龙詩品等。

从文学创作方面言，由于皇帝侯王文学需求上的落后性，由于东晋以来地主文学本身的不良傳統，因此，南朝一般的文学傾向走向形式主义与唯美主义的道路。同兩晉人一样，南朝文士抱着假古董主义，他們以用事用典可是几乎不能表达情志的四言詩，来点缀他們的老爷派头。他們对于散文，也象兩晉人一样十分重视对偶与駢比这种形式美，从而生产出一种所谓“駢体文”，产生一种充滿詞藻的小巧辞賦。而騰跃于建安时代的五言，虽然在南朝更是十分兴盛；但由于要求形式上的講对仗，搞声律，以至于用事用典，南朝的五言詩在齐梁以后也陷入唯美的形式主义泥沼。作者們在形式上挖空心思，而形式又是有限度的。因而，南朝文士模拟成风，各宗一家，互相譏笑。实际上，一般都缺乏新的創造，得不到巨大的成就。唐代詩人陈子昂、李白、韓愈及白居易等，他們都鄙薄齐梁，目为八代之衰，关键就在这里。当然，这种社会情势也决定了一些作者們例外的文学活动。不甘心做文学侍臣的謝灵运曾站在沒落的門閥立場写他的山水詩。厌倦官途的担不起小官僚苦悶的謝朓，曾用他的五言詩抒发他生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因而他們的写作与一般的文学傾向又不完全相同。

南朝統治者抑制士族的同时，也注意于拔用有才学的寒士庶民。因此，不論皇朝与王国也出现了貧賤出身的作者詩人。这些作者詩人由于侍奉統治階級不能不写出一些应制应酬的作品。但是他們写作中的最主要的东西却是不滿现实的情思的抒发，甚而以他們的真实描繪揭露了封建統治与封建剝削。从而詩歌成就超过了南朝的其他作者。代表着南朝时代，这在今天尤其看得清楚。

其次，南朝統治階級內部的政爭与火拼是空前的。皇帝們亟行誅戮，有的則有计划地杀害宗室。宋明帝刘彧与齐明帝蕭宝融是这种皇帝的代表。他們既是殘忍又复迷信。有的暗策策划杀人，还要焚燒香

火^[9]。他們一方面是殺人犯，一方面是善男信女。殺人的是他們，捨身的也是他們。這樣一來兩晉以來的道教佛教便盛于宋齊梁陳。和尚道士在宗教行業上是衝突的，因而又出現了兩教直接進行鬥爭的許多論文。如老子化胡經、笑道論、報應論及神滅論等。同時也因襲着前代志怪小說而分別為佛道作宣傳的如幽明錄冥通記等東西。這些東西雖然也是記載一些志怪故事，可是遠遠跟不上搜神記等著作了。

其次，自東晉偏安以後，由於北方人口大量南流，給江南經濟開發提供了數量很多的廉價勞動力和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從而江南農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而商業手工業也伴隨着發展起來。當時的建康、武昌、荊州以及交廣等都开始繁榮，所謂“貢使商旅，方舟萬計”。長江成為當時貿易與交通的一條大動脈。居住在都市中的城市居民，逐漸形成為最活躍的社會力量。也就因為如此，以城市市民文學為主的吳聲與西曲遂正式出現。它們在當時的文學中成為新的有力因素。

北朝第一個朝代是北魏，它直接繼承着連年戡亂的所謂五胡十六國。五胡十六國的前一階段是北方各異族侵凌漢族的時期，當時“異類群飛，奸凶角逐”，使中原黃河流域陷入千里蕭條的景況。在這個時期，入侵的五胡是談不到什麼文學寫作的。異族的樂曲歌辭也很少流傳下來。倒是他們中有的學習了漢族樂曲^[10]。與群胡屬旋的劉琨等也僅僅寫下一點點詩歌。五胡十六國的后一階段，是各少數民族展開生死存亡的鬥爭的時期。如果一個部族戰勝了，它就可以繁榮強盛，保持着鄉土與生活，如果失敗了，就遭到欺凌蹂躪甚而淪為其他部族的奴隸。因而匈奴與羯胡之間，羯胡與氐羌之間，鮮卑與鮮卑之間，在短短的期間內就發生了無數次的戰鬥，在他們“更相吞噬，迭為驅除”的情況下，黃河流域一帶遭到極大的破壞，漢族人民流離死亡，有的縣邑不滿百戶，有的已經是“靡有孑遺”。漢族的學術文化陷入空前浩劫，自然也提不到文學創作。但是由於各部族的鬥爭關係到部族人民的命運，因而各部族的武士英雄及其戰鬥事迹也自然為其人民所景慕所歌頌。所以在混亂的北方，也就有可能產生了一些小型英雄詩篇。追悼陳安的歌上歌，和惋惜慕容垂的慕容垂歌等，便是能

够保留下来的这类的民间作品。

北魏统一北方后，南北朝的对峙局面形成。北魏初期，鲜卑贵族以其落后的奴隶制的统治强加在汉族人民头上。施行残酷的种族压迫。汉族的文化艺术一时还得不到恢复与发展。鲜卑贵族与江南统治者一样曾经大倡道教佛教，借此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而且产生了象老子化胡歌及笑道论等东西^[10]。等到“孝文改制”以后，汉族较高的封建经济文化终于战胜了落后的鲜卑经济文化。北朝统治者一面尊孔兴学校，以儒家思想巩固其封建统治，并起用王肃吸收了南朝的典章制度加以采用。他们有意識的接受汉化，南朝的文化又相对地高于北朝，而南北朝文人的接触联系又日渐繁多，因此，北魏北齐的作者如称做北地“三才”的温子昇、邢邵与魏收都在模拟仿效南朝文学风格^[11]。至于北周，被拘留在长安的南朝文士如王褒、庾信，他们左右了北周文坛，南朝的文学潮流自然泛溢到关中一带。当然北周是以文化正统自居的王国，当他们眼见南朝文化进来的时候，有的有意識地要矫正齐梁的绮靡文风，例如苏绰模仿周语作诏令，就表现了代表西河文化者对江南文化的反抗。这也正是后来古文家攻击六朝骈丽的先声。但苏绰等完全局限在复古道路。其主观动机虽然是“务存质朴”，而客观上是“矫枉非适时之用”，从而在当时只是一现的曇花。

但是，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肯定北朝的文学成就。北方异族逐步接受了汉化，同时也把他们原有部族的牧歌与英雄诗翻译为汉文，并且把它充当他们的鼓角横吹曲歌辞（这些乐辞后来也为梁朝统治者所应用）。这些牧歌与英雄诗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情调，它们的出现也丰富了中国文学。

其次，在地志名胜的著作中，酈道元的水经注及楊街之洛阳伽蓝记的出现，在江山破碎的北朝时代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国的地志散文由它们保存了一些典范。

注 釋

〔1〕文心雕龙明诗篇：“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儿，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诗品：“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篇好斯文；平厚兄弟，都为文栋；刘楨王粲

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欽立案：兩汉时期，民間五言歌已經普遍地流傳与发展。西汉时五言大量应用在倡优乐府中，到了东汉皇帝的正乐也应用五言。建安时候，五言詩的力量更大。許多作者，他們拟作汉乐府时，把汉代四言或杂言的歌辞都用五言来代替。例如善哉行，古辞来日得大难原为四言，曹操曹丕的拟作都是五言。蒿里，古辞本来是杂言，曹操拟作是五言。薤露，古辞本来是杂言，曹操曹植的拟作是五言。可見五言体裁的盛行情况。

〔2〕九品中正制原为曹操在軍临时施用的制度。李重說它是“始于丧乱，軍中之制”。曹丕黄初元年，由尚書陈群把这个制度正式制定与頒布。制度规定各州郡設置中正，中正由政府任命中央高級官僚兼任，負責对本地士族知識分子家世、才能封建道德修养等評定为九个等級。政府可以案品授官，又可以案中途表現好坏或升或降。詳見通典。这是大族官僚把持政权借以达到中央集权的手段的合法化。

〔3〕世說新語文学篇：“何晏为吏部尚書有位望。时談者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問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語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又：“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弼)。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論，(即无名論及无为論)。又魏志九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馬景王(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凡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益欲以神況諸已也”。上述何晏的言論就是以玄學作为品題人物理論的事例。

〔4〕占田廢客制度頒布在平吳以后。是对士族官僚經濟特权的確認。官吏占用多少以九品中正的等級当作指标，一品占田五十頃，依次案五頃遞減，第九品則占田十頃。庶族佃客的數目是：一、二品十五戶，八、九品一戶。衣食客六品以上都是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一人。被庶族的人免除交租及服役的义务。

〔5〕晉書王衍傳：妙等善玄言，唯談老庄。义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世說新語歲時篇注引晉陽秋：“夷甫(王衍)有盛名，时人許以人倫鑒認。賞为天下士目曰：阿平(王澄)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王敦)第三”。又賞曹蕤：“王平子近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聞卫玠言輒叹息經例”。註引王澄別傳曰：“四海人士，一为澄所題目，則二兄(指王戎王衍)不复措意，云：已經平子”。

〔6〕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八王故事：“夷甫(王衍)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当世化之，羞言名教”。世說新語歲時篇注引晉陽秋：“初王澄有通朗称，而輕薄无行”。又世說新語簡傲篇注引邓粲晉紀：“澄放蕩不羈，詩謂之达”。

〔7〕釋時論有云：“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腐骨，不簡豈待多士丰于貴族，爵命不出閭庭。肉食繼踵于华屋，疏飯襲迹于薄耕。談名位以詭媚附勢，舉高貴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費者以泓澹为雅量，蕙蕙者以淺利为鎗鎗，膻胎

者以无檢为弘曠，儻垢者以守意为堅貞，嘲諤者以粗发为高亮，蘊藎者以色厚为篤誠，菴蕪者以博納为通濟，阨燕者以难入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隳閃者得清勳之聲，喻博怯畏于謙讓，闢茸勇敢于鬻淨。斯皆寒棄之死病，榮達之嘉名”。

〔8〕抱朴子詰俗篇引鮑敬言的无君論：“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是其皇天淳淳言，亦將欲之者为辭哉！”又云“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台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嫖男。采難得之貨，造无益之器，恣不已之欲，財力安出哉？役彼黎蒸，养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困矣”。又云：“君臣既立，众愿日滋。閑之以礼法，整之以刑罰，是犹辟滔天之源，障之以指掌也”。又云：“曩古无君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而自得，不竟不營，无榮无辱，純白在胸，机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安得聚斂以夺民財，安得严刑以为坑害”？

〔9〕南齐書蕭遙光傳：“遙光好吏事，称为分明，頗多慘害。每与上（蕭鸞）久清閑言半，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杀。上以亲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孙，欲并誅之。遙光計劃參議，当以次施行”。南齐書明帝（蕭鸞）紀：“性猜忌多慮，故亟行誅戮。潛信道术，用計數”。

〔10〕化胡經，西晉道士王浮撰，原为一卷，今石室秘宝本老于化胡經共十卷，是北魏人增成的。第十卷有化胡歌七首，老君十六变詞十首，都曾提到北魏灭佛毀法的事情”。

笑道論是北周甄鸞所著，誣毀道教。

〔11〕北齐書魏收傳：“（邢）子才曰：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聞之，乃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

第一章 建安时代的作者曹植

建安时代前后，新的五言詩体裁已由民間歌唱与“正乐”的大量应用有了很大的发展。发展大，流行自然很广泛，孔雀东南飞（古詩为焦仲卿妻作）長篇叙事詩的出現正是五言詩和叙事詩的里程碑。从另一意义上說，也是宮廷辞賦等假古董逐步衰落而民間詩歌逐步胜利的具体表現。五言詩既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及語言艺术广泛流傳，普遍地为作者所应用，如作者蔡琰才有可能用五言詩写出她的長篇悲憤詩，并取得了为她同一主題的另一篇楚辞体所不能取得的創作成就。而为曹操父子凭威权所收留豢养的流落文学之士，如著名的王粲、刘楨、阮瑀、应瑒、孔融、陈琳、徐干等所謂建安七子，他們在当时的統治阶級“御用”下，虽然要写一些軍国書檄等公事文，写一些命题

之下的詩与賦⁽¹⁾，以“述恩榮，叙酣宴”，粉飾統治者的軍閥事業，并為封建統治來服務。但是，這些文士也有他們不完全同於統治者的思想與理想，有他們的具体生活與深刻感受。從而他們中有些人也利用五言新體，反映了部分的現實。從此，五言詩成為普通寫作工具，由三國到“五四”以前其應用時期不下一千七八百年。

一、蔡 琰

蔡琰的遭遇 她是漢末作者蔡邕的女兒字文姬（一名昭姬）。初嫁于河東衛仲道，夫死無子，歸寧在蔡家，初平三年（191）正月，董卓將李傕郭汜，出兵击关东。虜掠了陳留、潁川等地方。她被羌胡軍虜去。興平二年（196）十一月，匈奴左賢王去卑在楊奉董承的率領下，以匈奴兵戰敗了李傕等，蔡琰遂又沒入南匈奴。文姬在胡十二年，生下二子。後來曹操用金璧把她從胡中贖回，第二次嫁給陳留人董祀。文姬整個遭遇是很悲慘的，生活中充滿着侮辱，苦難與悲痛。當她嫁給董祀時，感傷亂世，遂寫了有名的悲憤詩。一方面而是傾叙她的不幸的遭遇，一方面也抒发她回漢以後的惆悵心情。

悲憤詩的主要內容 這首五言敘事詩共五百四十字，一百零八句。在當時說來，是同孔雀東南飛相亞的一篇巨著。詩開始在概括了董卓作亂蹂躪中原之後，即具体描写胡羌誅杀虜掠漢族人民的殘暴情景。洛陽陳留一帶是：

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

獵野圍城邑的羌胡，他們“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這就是混戰的軍閥勾引胡羌軍的結果。被虜掠的婦女，她們“欲言不敢語”，“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她們流離失所，受盡了威吓與晉罵，真是達到了欲生不得欲死無由的悲慘境地。在具体描繪中，特別敘述了文姬個人的內心苦痛。她失掉家鄉，肝腸都碎了。她要犧牲自己的性命，但是得不到。只有揜天呼地悲泣災禍的臨頭。

詩接着用簡練的筆，敘述她在胡中的生活感受。胡人的風俗，胡地的風雨，處處使她，思念雙親，哀嘆無窮。

作者又集中地描写了她的舍子归汉前后的悲惨图景。把她的复杂的内心矛盾与苦痛借着具体生活的描繪深刻地做了表达。

在胡中，她是思念家乡关心家乡的。她希冀遇着的是乡里人可是往往又不是。那么，曹操贖她回汉显然是个幸运的事。但是回到家乡就必须拋棄生子，母子团聚，就不能脱离胡地。这就引起她强烈的复杂的内心堆滿矛盾和痛苦。汉朝使节到来以后，她实际上是必须离开胡地的。这就使她越是感到“念别无会期”就越发“不忍与之辞”。因此，在分手的場面上，作者对母子分离和同伴分离，作了具体的和动人的描写。

最后，作者描述了她故乡的荒凉和家园的殘破，这情景使她感到伤痛，感到魂不守尸，感到人生无聊和死期的迫近。結尾，她表示希望董祀不嫌棄她，使她能够“託命于新人，竭心自勵厉”。

悲憤詩的意義 文姬这篇叙事詩是描写个人身世，并用它向董祀陈訴希望获得对方的哀憫同情的。由于作者对当时战乱对羌胡的屠杀虜掠作了集中的具体的描写，因而就显出更为重大的艺术意义。过去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对胡羌、鮮卑等对于中国的侵袭与蹂躪是严重的，是史不絕書的。悲憤詩却給这种情况以形象的描写。表現了胡羌異族的野蛮与殘忍及其对文化較高的汉民族的摧殘与凌辱。这就有了很深刻的認識作用，使人們了解到抵抗外侮的正义性以及不得不与敌作生死斗争。而女性的遭受虜掠与蹂躪就更会激起汉族人民的同仇敌愾。这是酷爱和平自由、持人道主义精神的汉族人民在各时代中所以抛头洒血为和平生活而不怕牺牲性命的原因之一。其次，作品也表現出战乱时代女性的悲惨遭遇。在乱世中一切灾难都集中在她們身上。在敌人虜掠侮辱迫害中，她們欲死不得，却吃尽人世苦头。她們怀着骨肉分离的悲痛，封建礼教上的自卑感，婚姻上的担忧害怕。一切都摆布她們，一切對她們說都变灾难。因此，和平生活的实现，对女子們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說作品也具有着認識作用，当然，悲憤詩主要的是描写文姬自己的生活形象。这个形象在反映中国女子与異族的斗争上并不是一个典型。也就是說它不符合人民女性的性格，不代表人民女性的理想。它更多地表現了一个貴族家庭女子在

乱世中的行为与思想感情。例如胡羌对汉族人民的杀害掠夺是在軍閥的封建统治淫威下进行的。是阶级压迫下的种族蹂躏，足以说明封建统治者引狼入室的罪恶行径。但这丝毫不能认为汉族人民的脆弱，也根本没有通过战斗证明是脆弱的。可是蔡琰却作了“平士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的结论。很明显，她是从一个贵族妇女的角度对汉胡作了不正确的对比，看不到汉族人民的力量，这是必须括出来的。

悲愤诗的写作艺术 首先诗在表现手法上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剪裁。文姬的悲惨遭遇是复杂的多方的，而且是长时间的。但遭遇中有些是最关紧要最使作者惊心动魄的。也有些是一般的不重要的，只是一种过程或转折。作者对这两方面有了很好的剪裁与配置。譬如羌胡杀伐掠夺，作者的母子及归家后的悲哀等，这是叙事诗的中心事件，是最使作者痛定思痛的，因而她用了很大力气进行集中的形象描绘。这些部分都真实生动富有很大的感人力量。尤其象胡羌的描写与母子分离的描写更是绘声绘色，使具体场景出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文姬如何没入胡中和如何离开胡地等则只作了简要的叙述或高明的省略。其次是语言的使用。由于五言是民间来的新诗体，民间的语言艺术传统也作用着作者。全篇诗虽然应用了一些“雅言”，但合于口语气氛的语言仍然占大部分。通俗面富于生活气息。文姬的悲愤诗原为两首，这一篇是五言，又一篇是楚辞体。它们所处理的生活内容虽是一个，但用楚辞旧体所写的，完全赶不上这篇五言诗的真实动人。这件事足以说明汉末民间五言诗体的所以起来，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形式更容易使用活泼的口语更容易表现复杂的思想内容。五言诗的应用也正是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跨进一步。五言诗体在写作地位上替代了辞赋，这不单纯是文体发展变化的问题。这也是文学语言要突破地主阶级复古保守的雅言束缚向着接近全民语言的道路前进的问题。当然，此后五言体为统治者所垄断以后，它又曾陷入僵化的地步。

二、曹 操

曹操的生平及其写作特点 曹操(公元一五五——二二〇)，字孟德。东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年二十岁时凭借豪门势力被

举为孝廉。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在压迫人民对待农民起义上，他同其他地主统治阶级一样，曾组织地主武装镇压黄巾军，为了争夺地盘对人民进行过很多次的大屠杀。他阴狠毒辣，权谋诡诈，抱着“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心肠。谁都知道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割据一方的残暴的大军阀。但是由于他出身宦官家庭，为当时顽固的門閥士族所不齿，又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的腐败与紊乱，维系封建统治的儒家信条的破产，曹操遂一反过去积习，在政治上采取了严苛的法治制度和比较实事求是的革新措施。他实行屯田制来恢复生产，用打击門閥士族以加强他的封建统治，用否定所谓清议来选拔有用的人材，这都是他有效的政治措施。曹操的求贤令，抑兼并令，以及收租令等，说明了他的政治策略和野心。这些措施，对于平息北方战乱减轻人民负担来说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鲁迅先生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肯定曹操确是当时一个比较实际的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

曹操的这种比较实际的和革新的精神也反映他在文学事业的态度上。曹操大力招聚流泊的文学艺术之士，给他们以优厚待遇，使他们继续文学艺术学术文化活动，如建安七子及乐人段熲的被收留使用都是例证。曹操的这种措施对于东汉末文物图书“扫地皆尽”的情况来说也有着保卫及承继文化遗产的一定意义。其次，曹操在表奏写作上主张“勿得浮华”。也就是要朴素真实，在辞赋的写作上；主张不要一韵到底，而要“善于质代”，也就是要合适地变换韵脚。甚而在虚字的使用上，曹操都提出并实践他的主张。如他在写作上不喜爱由楚辞遗留下来的兮字^[2]。他甚至注意到一个“尔”字在使用上的口气（他说：谗言生女尔，尔非佳语。）可见曹操在语言使用上是实事求是的，具有着现实精神。也就因为这样，曹操的诗歌，即使是杂言乐府，从无一首用兮字的。他的制令等散文，都基本上接近口语，有着活语言气息。这正是曹操诗歌写作具有质直风格情调的主要原因^[3]。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曹操等的以新体五言诗改制许多四言及杂言乐府